

QUYU ZHILI YU JIXIAO

区域治理与绩效

2009年浙江发展经验与中国模式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 主编 郎友兴 [瑞典] 史雯
毛丹 [瑞典] 罗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区域治理与绩效

2009 年浙江发展经验与中国模式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郎友兴 [瑞典]史 雯
毛 丹 [瑞典]罗 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治理与绩效 / 郎友兴等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308-08477-2

I. ①区… II. ①郎…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文集 IV. ①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7453 号

区域治理与绩效

主 编 郎友兴 [瑞典]史 雯
毛 丹 [瑞典]罗 杰

责任编辑 余健波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477-2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主 编 前 言

一

这是一本基于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而编辑的集子。研讨会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浙江发展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Zhejiang Today and China Tomorrow: Reflections on Experiences in Local Govern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此研讨会于2009年12月5日至6日在杭州召开。来自中国国内约50位学者、地方官员和来自瑞典、美国、德国、韩国、西班牙等国10名海外学者,就浙江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

二

会议共收到中英文论文43篇,我们从中选出23篇论文编辑成册。不过,首先要说明的是四位主题发言。尽管三位主题发言者美国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杰(Roger Greatrex)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学部委员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丹教授的发言稿子没有编入论文集,但是他们的发言值得在此作个介绍。在这个前言中先择其主要观点或思想与读者们分享。

傅士卓教授在题为《制度、制度化及其治理》(*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Governance*)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以往对于中国研究的相关理论似乎并不是很有用,难以解释中国的经验,因此他提出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逻辑,而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变迁有可能会导出出现新的理论或理解。他着重讨论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并具体分析浙江的经验,尤其是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温州商会的功能。他的基本结论有三个:(1)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制度创新的案例或经验;(2)制度化依然缺乏确定性;(3)正式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罗杰教授是一位研究浙江法律问题的西方学者,他为大会作了《让浙江市场化起来——浙江著名商标和品牌及其法律保护》(*Marketing Zhejiang — Zhejiang's Well-known Trademarks and Famous Brands, and Their Legal Protection*)的报告。他以浙江为案例,讨论了商标注册、著名商标与法律保护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报告中,罗杰教授具体分析了杭州张小泉集团、金华火腿等著名品牌所面临的法律保护的问题。他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1)在商标、品牌的审查机制和程序上保护的缺位;(2)腐败的官员牟取不正当利益;(3)知名品牌正成为增强消费者信心的一种手段,但是跨省区的法律保障依然有不少问题。

景天魁教授以浙江宁波为经验,探讨了社区成长的问题。在《探索社区发育的逻辑》的报告中,他试图找出参与社区发育过程的诸因素的逻辑次序,以期对当前基层社会发育的动力和机制作进一步的描述,并结合在社区建设实践中做过许多有益探索的浙江省宁波市的经验,对社区发育过程的逻辑提出初步的假设,尝试建立刻画社区发育逻辑的准递归模型,尤其是他根据宁波市社区经验所得出的社区发育逻辑的准递归模型,引起与会学者、官员的强烈兴趣。他的结论有三个:(1)社区文化建设是整个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虽然在社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重点,但社区文化建设应该始终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2)按照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起点的逻辑次序开展社区建设,成本最低,效果最好;(3)在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组织建设缺乏必要基础的情况下,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虽可提倡,但如果倒过来将其作为社区建设的起点和重点,难免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他最后指出,社区建设之道在于大兴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形成中国社区特色。

在题为《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的演讲的一开始,毛丹教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中国仍然是一个“村庄大国”,村庄有没有未来?对于这个问题,他尝试归纳了几种典型的回答:(1)主流经济学的回答是通过城市化村庄最终是走向衰亡的;(2)从政府的层面来看,目前政府政策的信息是矛盾的,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新乡村建设运动重视乡村乡土性的价值,提出重建乡村。他接着从四个维度来讨论。第一个维度是批判社会学的视野。这个维度认为,村庄有没有未来,取决于是否听任市场化力量扫荡村落共同体。第二个维度为专业社会学的维度。这个维度认为,村庄有没有未来,取决于小型地方共同体在当代社会是否有生命力。第三个维度为公共社会学的维度。这个维度所关注的是村落共同体与公民社会,认为村落共同体作为地方性共同体是不是公民社会的敌人,取决于公民社会被认为应该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方法论社群主义。在后者立场看,适当的村

落共同体是友善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第四个维度为政策社会学维度。这个维度认为,村庄前途取决于能否创造城乡衔接。他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政府在村庄建设的问题上需要清楚地告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立场。

三

研讨会就“浙江经济转型与发展”、“浙江发展经验的总体性分析”、“浙江农村转型与治理”、“浙江地方治理和文化”、“民主与地方的公共参与”和“法治浙江”等议题,讨论了浙江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变迁与问题。选入本论文集的论文主要从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分析浙江的经验,因此,有不少优秀的从经济学、史学和文化学角度解读浙江经验的与会论文没有选入,这是本论文集的一个缺憾。

在“浙江发展经验的总体性分析”议题中,我们选了6篇论文。蓝蔚青教授在《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中将浙江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浙江经验的特点,并且指出“浙江经验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范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研究员的《浙江经验——中国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以“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为框架,从四个方面对浙江经验作了总结与分析:(1)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的生产组织;(2)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3)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的生产形式;(4)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的联结纽带,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价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国权教授、李院林博士所合著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认为,浙江的强县发展又是“浙江现象”一个重要的特点。浙江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地方政府的创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浙江县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先发优势和制度落差,从而带来一批“强县”的形成,而强县发展又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创新,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促使浙江县域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温州市社联洪振宁主席对温州模式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作了详尽的梳理。他所提交的《改革先行者的历程、理念和精神》论文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人创业创新的突出表现,“创新共生”是温州人的经营理念,文章还总结探索了温州人精神和温州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浙江省委党校董明教授的《科学发展何以可能:在政府推手与民间力量之间——对一个案例的经验阐释》以一个代表性的个案——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为例,通过追溯既往,从中厘析实现科学发展的两个关键变量即政府推手与民间力量之间,究竟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互动,进而揭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路径。她的结论性评论应该值得人们重视。而陈剩勇教授在《浙江模式的发展危机与应

对之策》中则指出了近一些年来浙江在其本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他建议,“现阶段浙江的地方政府创新和体制改革,必须改变市场化初期单兵突进的改革模式,而代之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经济、社会和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协调推进,以治理模式的创新提升‘浙江模式’”。

“农村转型与治理”议题共选了8篇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教授的《当代乡村治理变迁的特点和经验——以建国60年来的浙江为例》重点梳理了60年来浙江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特点。同样来自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应小丽副教授以《农民自主行为推动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基于建国60年来的乡村经验》为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浙江乡村经验的考察,发现依据“顺从—叛乱”的经典模式已很难理解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浙江省民政厅的王应有从其工作经验出发讨论了浙江省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型构及其治理问题。浙江大学赖金良教授的论文《我们与他们:关于社区内部分隔的观察与思考》讨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社区内部分隔。浙江省委党校的王国勤博士的论文《村庄政治制度化的微观基础:以石磁村“乡村典章”为案例的考察》,通过对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历时五年多的“乡村典章”制度化过程(2004年至2009年)进行案例分析,并提出一组关于村庄政治实现制度化何以可能的命题。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的论文《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通过个案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所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企图以此来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浙江大学苏振华、许英杰的《村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浙江省七贤桥村和江西省洪峦村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七贤桥村和江西省洪峦村的比较,讨论了村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逻辑的问题。浙江省义乌市委党校的周松强的《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论文,试图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以期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力所能及的探索。

“民主与地方的公共参与”议题共选了5篇论文。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周俊博士等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一文中指出,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浙江

省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以温岭民主恳谈与公共预算改革为例,从各个方面讨论了如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启示——以温岭民主恳谈与公共预算改革为例》一文中,就基层民主建设他提出了五点建议。浙江省温岭市委党校朱圣明的《协商民意测验之中国版本——来自泽国预算民主实验的案例研究》认为,温岭市泽国镇的预算民主实验提供了协商民意测验之中国版本,是起点的抽样民主与结果的代议民主的结合,是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直接民主又有异于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基层民主创新,它的出现对于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形式、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浙江省委党校的张静蓉教授在《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地方治理结构的优化——基于浙江的案例研究》认为,从天台和温州的实践来看,中国正在生成的公共领域,确实在民意的直接表达方面,与政府的公共权力形成了互动,公共权力向着顺应公共意见的方向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对地方治理的优化产生了积极的成效。浙江海洋学院的陈莉莉副教授在其论文《论“参与型”公众环境利益诉求机制——以和邦化工事件为例》中,以和邦化工事件为例,讨论了“参与型”公众环境利益诉求机制问题。

“法治浙江”主要讨论的是与浙江的法治有关的议题,共选了4篇论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孙笑侠教授和钟瑞庆博士在其《先行法治化论纲》一文中指出,浙沪三地的法治实践代表着中国东部的法治发达水平,它们已经先行发展了区域性的法治;其进程实践告诉我们,法治或法治秩序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他们的结论是,先发地区先行法治化,完全可能成为我国向法治转型的基本模式。郑磊博士在《“法治浙江”以“法制浙江”为核心》一文中认为,“法治浙江”不应无视法治规律而使法治行政区划化;应在国家实定法秩序的藩篱之内,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聚焦于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季涛和宋小海的长文《浙江先行法治化进程的中立性司法审判》详细地讨论了浙江省先行法治化进程中的司法改革问题,尤其是中立性司法审判问题。浙江大学的张丙宣以浙江省为例讨论了分税制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调整与经济绩效的问题。

四

与会学者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有些观点也相当有意思,例如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模式”,因此恐怕也不存在什么“浙江模式”,这一看法引起与会者的争议。但愿《解读浙江发展经验》这本集子有助于人们对浙江的认识。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浙江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资助。隆德大学的史雯教授

(Marina Svensson)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联络和组织工作。会议的召开也得到了合作方隆德大学的资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郎友兴

2010年10月于杭州

目 录

主编前言

I. 浙江发展经验的总体性分析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	蓝蔚青	(1)
浙江经验:中国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 ·····	杨建华	(13)
浙江模式的发展危机与应对之策·····	陈剩勇	(19)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	陈国权、李院林	(24)
改革先行者的历程、理念和精神 ——温州改革发展 30 年综述 ·····	洪振宁	(35)
科学发展何以可能:在政府推手与民间力量之间 ——对一个案例的经验阐释·····	董 明	(56)

II. 农村转型与治理

当代乡村治理变迁的特点和经验 ——以建国 60 年来的浙江为例 ·····	卢福营	(78)
农民自主行为推动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 ——基于建国 60 年来的浙江乡村经验 ·····	应小丽	(91)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 ——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郎友兴	(100)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型构及其治理·····	王应有	(115)
我们与他们:关于社区内部分隔的观察与思考 ·····	赖金良	(128)
村庄政治制度化的微观基础 ——以石磁村“乡村典章”为案例的研究·····	王国勤	(141)
村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	苏振华、许英杰	(166)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

- 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周松强 (178)

Ⅲ. 民主与地方的公共参与

-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周俊、郁建兴 (187)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启示

- 以温岭民主恳谈与公共预算改革为例…………… 张学明 (199)

协商民意测验之中国版本

- 来自泽国预算民主实验的案例研究…………… 朱圣明 (204)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地方治理结构的优化

- 基于浙江的案例研究…………… 张静蓉 (225)

论“参与型”公众环境利益诉求机制

- 以和邦化工事件为例…………… 陈莉莉 (255)

Ⅳ. 法治浙江

- 先行法治化论纲…………… 孙笑侠、钟瑞庆 (262)

- “法治浙江”以“法制浙江”为核心…………… 郑磊 (272)

- 浙江先行法治化进程的中立性司法审判…………… 季涛、宋小海 (284)

分税制后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调整与经济绩效

- 以浙江省为例…………… 张丙宣 (327)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模式

蓝蔚青

浙江经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充分尊重民众的自主创业权利,率先建立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支持和引导广大民众自主创业,自强不息,自我积累,自愿联合,大力发展民本经济、民主政治、民办文化、民间社会,走全民创业、共同富裕之路,使浙江在陆域资源匮乏^①、国家投资少^②、没有特殊优惠政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从全国中游走到前列,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了社会全面发展而且比较安全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全国领先并且差距较小,民众的政治参与活跃有序,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浙江经验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范例。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历程

三十年来,浙江的改革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主要是从“增量”改革起步,率先探索市场取向的改革。

浙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发展经济的措施。鉴于浙江国家投资少,国有企业少,是农业省,各级政府普遍从恢复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入手,率先在国家计划控制范围外进行增量市场化改革,并从流通领域的改革入手,解决农村工业的产供销问题。从1978年允许长途贩运,1979年起逐渐放开城乡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小商品市场,形成十万购销大军,到80年代初建成一批专业批发市场,支持到省外承包柜台和建立分市场,全面带动了流通体制改革和服务业的发展。温州等地还进行了开辟人才

① 浙江人均耕地只有0.5亩,没有发展重工业的矿产资源,人均资源综合指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为全国倒数第三。

② 由于浙江地处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前国家没有安排重大投资项目,1953年到1978年,年累计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居全国末位。

市场、科技成果市场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探索,使部分生产要素也开始通过市场配置。1983年初,中共浙江省委就明确提出要树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1984年5月又明确提出发展各项事业都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使改革的探索更加自觉。在农村工业化和市场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建起一大批小城镇,形成了把民间能工巧匠和经营管理人才优势转化为营销和加工优势,换取省外资源、市场和利润,实现民间资本初步积累的“贸易兴省”战略,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并影响和推动城市改革发展的富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道路,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城镇、大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浙江发展模式。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也开始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通过省际协作引进物资、资金、技术和人才。从实际出发作出的这一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浙江改革发展道路的特点。到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6%和37.9%,迅速上升到全国第5位和第4位,基本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

从1984年起,浙江全面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探索,开始了股份制试点。城乡个体、私营和股份制合作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政府积极推动横向经济联合,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农村三次产业相互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市场化。商品市场蓬勃发展,生产要素市场逐渐兴起。发达的市场购销渠道成为浙江经济的巨大优势,形成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地经济,兴一座城镇,富一方百姓”的发展道路。从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特色产业起步,逐渐发展起具有比较优势的块状经济。宏观调控、劳动用工、社会保障、财政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全面推进,实施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的“星火计划”和加强高新技术开发的“火炬计划”,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科技机构发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建立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人员的新老交替和知识化、专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公职人员的选拔、考核制度改革。经常性的创建文明单位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开放文化市场,调动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地方法制建设日趋加强和规范,治安责任制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此阶段,全省GDP年均增幅居全国第2位,GDP总量和人均GDP由第12和16位上升到第6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上升到全国第4和第3位,相当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水平过渡。浙江进入了经济大省行列,日益引人注目。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主要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加全面的发展。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省人大制订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全省掀起了兴办民营企业的高潮。同时率先探索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集团,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大批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或私营企业。1998年,全省90%以上的乡镇集体企业完成改制。许多县域的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2000年与1991年相比,全省国有工业企业由3209个减少到1002个,其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却从126亿元增至214亿元,利税总额由57亿元增加到105亿元,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国有资产集中到重要和关键领域,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和控制力。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大发展大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不断提升商品交易市场,积极培育生产要素市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规范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基本形成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使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市场化。通过撤区扩镇并乡和小城镇综合改革,推动农村城镇化,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积极培育主导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山区资源和旅游资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行财政增长综合分成,鼓励发展县域经济,全省贫困县到1997年底全部脱贫。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文教事业和公用事业,大大加快了这些领域的发展,突破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制约。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富有活力的科技运行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制定和实施《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纲要》,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依法治省”的决策,推广执法评议和述职评议,强化人大的监督作用。干部理论教育和基层思想教育实现制度化,干部制度改革开始从单项突破向整体推进发展。

90年代后期,浙江开始致力于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加全面的发展。在促使国有资产集中、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到政策上一视同仁。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和区域特色农业,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区域化和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全方位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绿色浙江”。加快城市化进程,拓展城市空间,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扩大经济发达县(市)经济管理权限,进一步调动了县(市)的积极性。率先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规范审批行为。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开展住房制度改革。大力发展社会力量办

学,多渠道发展高中段以上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新世纪人才工程。提炼和弘扬浙江精神,率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注重经济文化相互促进。大力推进决策和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高管理透明度,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

在改革的推动下,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都上升到全国第 4 位,1999 年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 100%。浙江从屡遭质疑变为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第三阶段:2003 年以来,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互动共进,全面发展,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浙江。

这一阶段,浙江更加自觉地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机结合,全面推进,初步迈上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轨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努力营造平等竞争、有利发展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向现代市场体系提升转型;大力推动结构调整,下决心压缩过热行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切实加强薄弱环节,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服务业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施品牌战略结合起来,努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品牌大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着力提高浙江经济的国际化水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市化;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使欠发达地区和海洋经济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优化发展软环境;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扎实推进生态省建设。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大社保体系,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建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增强竞争软实力;做大、做强、做优正面舆论引导,推动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用富有成效的教育和实践活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对民众的思想凝聚力;扎实有序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不断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积极建设“法治浙江”,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围绕民生问题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省,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水平。

2007 年,中共浙江省委又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浙江发展的总战略,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以全面改善民生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创业富民为动力,创新强省为导向,把全民创业进一步引向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党建工作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明显增强,成为改革开放 30 年中波动最小的时期。从 2005—2008 年,人均 GDP 四年跨过 3000、4000、5000、6000 美元四个大台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的主要成就^①

经过短短 30 年的改革开放,浙江从一个农业省发展成工业大省、经济大省,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轨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全面进步,稳定和谐,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和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均居全国第四,全省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接近 90%,有望比全国提前 10 年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浙江从全国的中游走到了前列,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78 年浙江的生产总值只有 123.7 亿元,2008 年达到 21487 亿元,居全国第 4 位;1979—2008 年全省 GDP 年均增长 13.1%,不仅大大快于改革开放前 29 年年均增长 6.2% 的速度,而且比同期全国平均年增长率高出 3.3 个百分点,增幅全国第 2 位;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331 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2214 元,居全国第 4 位和省区第 1 位,年均增长 12%,增幅全国第 1。而且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前 29 年,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差距高达 43.7 个百分点,而 1996 至 2007 年期间缩小到 4.7 个百分点,开始走上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二、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38.1 : 43.3 : 18.6,转变为 2008 年的 5.1 : 53.9 : 41;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例,由 74.8 : 17.1 : 8.1,转变为 2007 年的 20.1 : 46.8 : 33.1,这标志着浙江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适应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的质量、档次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农业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77.3 : 3.0 : 14.3 : 5.3,调整为 2007 年的 45.1 : 5.6 : 22.3 : 25.3;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也由 1978 年的 72.9 : 27.1,调整为 2007 年的 49.5 : 50.5。工业结构改变

^① 本节数字均引自浙江省统计局:《数字变化看浙江》(初稿)。

了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格局,2007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4.6%和8.1%;在全省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比重分别达到43.3%和7.9%。到2007年,全省工业领域拥有中国名牌产品239个,国家免检产品534个,中国驰名商标1869件,均列全国前两名。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服务业发展更为迅速。

基础设施得到加强。长期以来困扰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基本形成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通信网络,2007年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达到每百人47.5部和69.7部,互联网用户达到681万户。2003—2007年五年形成的电力生产和输变电能力超过了前50多年的总和。实施“千里海塘工程”和“千里江堤工程”,建成了抵御五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台风和洪涝灾害的标准海塘江堤,大大增强了防灾抗灾能力。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进程居全国第二,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共同发展。1978年到2007年,浙江生产总值增量的71%来自于民营经济,其中55%是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二、三产业新增人员中,近90%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个体私营经济也是税收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个体私营经济还从市场观念、创新意识、经营机制、用工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为国有企业和传统集体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国有企业改革解决“钱从哪来,人到哪去”的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2006年浙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居全国第5位,净资产居第4位,实现销售收入居第4位,利润总额居第3位,净利润居第2位。2007年,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96个,成交总额9325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十亿元市场133个,超百亿元市场15个,市场成交总额和单个市场成交额连续17年居全国第一。围绕市场已形成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0%。其中年产值10—50亿元的202个,50—100亿元的46个,超过100亿元的37个。区域特色经济把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集聚起来,形成外部规模效应,有力地引导和保障着企业的生产,促进着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合作,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和龙头企业的成长,促进了共性技术和商标品牌的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环境共保,并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资本、技术、劳动、土地等要素市场也逐步建立和健全。大大减少并规范了行政审批,政府职能逐步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区域合作成效显著。全省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7011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768亿美元,增长2521倍,年均增长31.0%;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从0.7%提高到52%,出口结构实现了从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劳动、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转变。1979—2007年,全